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3.007

《千万别丢下我》中的黑尔舍姆体制与叙事伦理^①

朱云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7)

摘要:亚当·纽顿的叙事伦理着重关注叙述行为、叙述中的不可靠性和读者移情。依此理论进行阐释,《千万别丢下我》中的叙述者凯茜讲述个体生命故事的动因在于其对黑尔舍姆体制的怀念与昭示,她的第一人称叙事的不可靠性则折射出她对黑尔舍姆体制的顺从和矛盾心理,而小说与文本双重层面的读者在阅读体验与文本见证中会产生移情性反思,并做出伦理回应。

关键词:《千万别丢下我》;叙事伦理;叙述行为;不可靠叙事;读者移情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3-0037-06

The Hailsham System and the Narrative Ethics in *Never Let Me Go*

ZHU Yu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7, China)

Abstract: Adam Newton's "narrative ethics" highlights three aspects, namely narrative action, unreliable narrative, and empathy in his theory. In light of the theo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Never Let Me Go*, the impetus of Kathy's narration of her life story lies in her memorizing and exposing Hailsham, her unreliable narration indicates her obedient but conflicted feeling toward Hailsham, and readers on double levels have empathy in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

Key words: *Never Let Me Go*; narrative ethics; narrative action; Unreliable narration; empathy

在一个人类可以借助遗传学等科学手段改变生命代码的后人类时代,是否可通过制造克隆人类以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问题日益惹发争议,围绕其展开的科学技术与道德关系方面的生物伦理之争也无休无止。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千万别丢下我》(*Never Let Me Go*, 2005)以丰富的想象预显了一个充满悲悯与被抛感的克隆人世界,在文学领域再次触发对生命与伦理的思考。布鲁克·艾伦(Brooke Allen)高度评价该小说,称其为“迄今为止,在当今拥有无限技术潜能的‘美丽新世界’中,最为完美地诠释生物伦理家深陷骇人道德困境的精湛作品”^[1]。小说借31岁的克隆人凯茜·H的声音,通过她的回忆拼接起一段克隆生命的个体体验和影响与塑造这段体验的黑尔舍姆体制(Hailsham)。如果克隆人注定是被生物科技操纵和人类话语压制的无法言说的他者,那么凯茜则依托石黑一雄的虚构文本给人类提出“一个严厉警告”^[2]²⁰²,让他们获得“史无前例的情感体验”^[3]。《千万别丢下我》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将凯茜的个体生命故事与左右这段生命故事的体制并置,在叙述者凯茜和故事亲历者凯茜的双重视角中展开。刘小枫指出,“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提出了“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

① 收稿日期:2014-11-15

作者简介:朱云(1980-),女,江苏扬州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英美文学研究。

意识和伦理诉求”^{[4]4}。凯茜的讲述使叙述与聆听、叙述与阅读之间建立起联系,也使叙述之事在聆听者与阅读者身上产生通感效应。这种叙述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契合了亚当·纽顿(Adam Zachary Newton)的叙事伦理理论。纽顿从叙事行为本身入手,关注“讲述故事和将人物虚构化的伦理境遇,以及讲述者、听者、读者在叙事过程中的相互关系”^{[5]11}。他强调,叙事伦理是三种伦理的结合体,包括“(1)讲述的伦理(讲述行为本身需要实现的原因和造成的结果);(2)具象的伦理(通过将‘人’变成‘人物’而使自身或他人虚构化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3)阐释的伦理(读者的阅读行为所产生的伦理批评责任)”^{[5]17-18}。本文试以亚当·纽顿的叙事伦理理论为观照,从叙述行为、叙述中的不可靠性和读者移情三方面考察《千万别丢下我》中的叙事问题,分析凯茜讲述个体生命故事的动因,阐释她的第一人称叙事的不可靠性所折射出的她对黑尔舍姆体制的顺从和矛盾心理,以及读者在阅读体验与文本见证中产生的移情性反思。

1 黑尔舍姆与其终极目的:讲述以昭示

《千万别丢下我》可被视为一部克隆人自传,它以克隆人凯茜的第一人称视角审视自己成长及至将临的死亡之间的人生故事。故事开篇,叙述者清楚表明身份:“我的名字叫凯茜·H。我现在三十一岁,当看护员已经十一年多了。”^{[6]3}而小说结尾则是她收起泪水,朝她已知的命途坚定而去,作品由此实现了对凯茜生命体验的完整讲述。克里斯蒂娃将著述一生的计划描述为“一场与身体机能下降和蜕变的战斗”^[7],凯茜则是同时在与身体机能和外在于身体的特殊体制的双重战斗:即将成为“捐献者”且挣脱不出规训其生命存在的体制。与她曾看护过的许多捐赠者一样,她需要在生命尽头到来前一吐为快,既带着对自己珍视的人与事的记忆离开,也将这段记忆留给别人。其实正如书名“千万别丢下我”表层意思所示,凯茜不想自己存在的痕迹在死亡之时磨灭,她渴望借叙述确立与他人的联系。亚当·纽顿借用列维纳斯的“说”(Saying)的概念阐释,叙述建立起“对话机制,其中涉及言说者与他者之间的交流,涉及伴随叙述行为而产生的主体间的责任和要求”^{[5]17}。凯茜的讲述源于想告诉别人“自己是谁”,进而因为解释“自己为什么是谁”而演变为对黑尔舍姆培养克隆人方式的讲述和对黑尔舍姆体制的揭示。

卡瓦雷洛(Adriana Cavarero)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有一个基本的欲望,就是要告诉别人我们是谁,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8]38}。讲述让我们了解自己、建立与他人和世界的联系,产生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之将死时,这种渴望更为强烈。凯茜曾不止一次地见证过她看护的捐献者在“痛苦和麻醉药、精疲力竭的不眠之夜”^{[6]6}依靠回忆与记忆触摸着生命和世界,通过凯茜维持着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凯茜同样如此。讲述总是对对象的讲述,对叙述者讲述责任的履行和对讲述对象聆听要求的满足。凯茜的讲述对象“你”是与她一样暂时充当的“看护员”克隆人。表面看来,她的讲述会围绕“看护员”工作的成功经验展开。但叙事进程中,凯茜很快发现自己始终绕不开“黑尔舍姆”。虽然她试图将黑尔舍姆抛诸脑后,但她发现自己的一切都与黑尔舍姆息息相关。她由此将“自己是谁”与“自己为什么是谁”的讲述结合,在与聆听者的对话中呈现克隆人享受人类“保护”获得人类灵魂的体制。

依照监护长埃米莉小姐的界定,“黑尔舍姆被视为一座闪亮的灯塔,一个我们如何逐渐以更人道、更良好的方式做事的榜样”^{[6]289}。这里没有人类与克隆人之分,只有“监护人”与“学生”的差别。“监护人”按照人类的教育学制和体制为学生开设各类课程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通过“等级分配标示出差距,划分出品质、技巧和能力的等级并据此给予惩罚和奖励”^[9]。他们定期举行交易会,允许学生在交易会上用“代币”相互间购买物品,让他们体验人类生活;鼓励克隆人尊重彼此的工作,以“创造”能力决定个体如何被看待、喜欢或尊重;一位被称为“夫人”的人会定期出现,挑走学生最好的作品,令他们产生荣誉感。这些有利于塑造学生的“个体价值感”和“集体认同感”^{[1]15},也为他们离开黑尔舍姆后面对克隆人残酷的生存现实预备了理性应对的能力。黑尔舍姆也凭着对学生地理空间与想象空间的共同圈围为他们编织了“美好”童年的幻影。

无论黑尔舍姆对克隆人的培养计划如何,无论它要向人类世界怎样证明克隆人具有灵魂,它的终极目的是培育人类的器官捐献者而不是提供克隆人的保护地。所以凯茜是与受述对象一样的器官供应者,她与它们共同面对的是有无灵魂的克隆人共存的失乐园。人类受益于科技进步,压倒一切地考虑“他们的孩子、配偶、父母、朋友能够不因癌症、运动神经元疾病、心脏病而丧命”,选择“不去想”^{[6]294}以逃避正视克隆人存在的事实和对克隆人进行工具性剥削所应承担的责任。黑尔舍姆以人类教育的模式培养克隆人人性的做法以及莫宁戴尔试图创造出优于人类的克隆人的科学计划让人类从逃避至恐慌,要求克隆人回到无声无息中。克隆人重新变成“试管里难以捉摸的东西”^{[6]292},只存在于“政府开设的庞大的‘基地’”^{[6]296},回归到由“陌生人的意图”进行编码的“产品”^{[10]218,223}位置。凯茜对此的讲述将她的个体生命体验延伸至她的聆听者,因为共同生存体验的交流而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昭示了他们受体制操控而存在的为他性。她也在讲述中邀请她的交流对象共同见证消失的体制和一段没有消失的记忆。

巴赫金曾说:“只有当我的生活向他人阐明时,我才成为其主角”^{[5]23}。他此处所言的“主角”实指向他人讲述自身故事时所承担的责任。凯茜讲述的初衷从强调自己是谁和渴望不被遗忘的“千万别丢下我”逐渐发展为讲述黑尔舍姆体制和她渴望不被体制“丢下”的伦理诉求。她的讲述责任也从分享个体生命体验扩大为向与她具有共同命运的器官供应者呈现一段对于克隆人而言曾经美好的生命印记,并使之成为他们共有的记忆。

2 叙述的不可靠:黑尔舍姆操控下的顺从与矛盾心理

作为一部类似于传记的虚构作品,《千万别丢下我》具有此种文类的一般叙事视点的特征,即叙述者是“站在一定的位置、或远或近的距离”^{[11]587}观察自己,就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进行有选择地讲述。这种叙事风格延续了石黑一雄的前几部作品,叙述者“沉浸于自己的关注和焦虑中”^[12],叙述的内容带有明显的主观选择性。纽曼论证,当叙述者将自己变为故事中的人物时,“他们之间会产生细微但重要的距离,会在自我描述或在他人的描述中产生或得或失甚至危机感”^{[5]18},这是主体进行自我掩饰的开始。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会竭力建构因果关系,用一系列不同等重要的事件拼接起连贯的故事,对之做出价值判断和伦理性决断。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提出,“第一人称叙述归根结底是一种告白,叙述者有什么需要讲述,就有什么需要掩饰,使用‘我’字的叙述者会用最聪明的方式掩饰自己”^{[13]135}。凯茜的叙述凸显了她与露丝和汤米之间的关系,但她在叙述中的不确定和所述故事本身的“表征力”^{[5]19}暴露了她对黑尔舍姆体制的顺从和矛盾心理。

凯茜的第一人称叙事具有双重叙事眼光,即“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和“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它们体现出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形成“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14]。生活在黑尔舍姆的凯茜与其他人一样,会对许多现象提出疑问,但由于年龄及环境的限制,他们会任之发展,采取避而不视的态度。例如他们对“画廊”的看法。画廊在黑尔舍姆学生心中具有神秘性,他们想象“夫人”定期出现拿走作品的目的是将最好的作品呈现给别人看。但他们自觉将对画廊的谈论视为禁忌,而且他们都畏惧,如果深入探究,会陷入自己还未准备好去面对的领域。凯茜在追忆中认识到,所谓的画廊,其实是从黑尔舍姆的学生中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说法,她自己现在连他们是否真的相信画廊的存在都已经不确定。与“夫人”会面时,凯茜了解到画廊子虚乌有,他们的画被选出来只是为了向人类证明他们也有灵魂。

第一人称叙事因为叙述者的限知性和叙述者对所述事件的选择与控制,常被认为具有不可靠性。凯茜在讲述之初即声称,她所述之事都已是许久以前的事,“有些情况可能会记错”^{[6]14}。但无论她是否记错,读者所了解的都是经过她选择的事件。在讲述与露丝的友谊时,凯茜呈现了露丝如何介入她与汤米之间成了汤米的女朋友;她们如何在村舍时期产生分歧;露丝种种令她不满的表现及至她们最终分道

扬镳;她在露丝生命的最后时光与她的相伴。然而这些故事又凸显了另一个不受限于黑尔舍姆体制的露丝:她富于幻想,这与黑尔舍姆的一切格格不入;离开后,她便将黑尔舍姆的一切抛诸脑后;虽然被告知不可能像人类一样有工作的机会,露丝却因一张海报幻想自己的办公室生活,会去探究她的可能原型。对于克隆人只要能证明彼此真心相爱便可推迟捐献的传言,露丝想尽方法弄到“夫人”的地址,希望凯茜和汤米能去尝试。凯茜、露丝和汤米之间的故事,本身透露出凯茜对自己作为朋友的不忠、沉溺于现状、畏惧真相的遮掩。她时常将自己置于揭示真相的位置,无论是露丝童年炫耀铅笔盒的事件,还是在村舍时露丝幻想办公室生活事件。对于汤米的绘画事件也是一样。她与汤米在一起时赞扬他的画,与露丝在一起又嘲笑他;露丝向汤米透露她们对他画作的态度时,她选择逃避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这也导致他们三人从此分开。再度聚首时,凯茜因为汤米与她的观点相同还表现出战胜露丝的一丝欣喜。对于露丝找到的地址,她的反应只是“这一切都够了”^{[6]260}。被告知推迟捐献于虚乌有、获知更多克隆人历史和现状后,她仍保持冷漠式的平静。她对命运的逆来顺受暴露了她自身性格的弱点和黑尔舍姆体制的认同与顺从。无怪乎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质问:“获知更严重、更久远的事件背景,它挥之不去地左右着他们的童年、他们的情感纠葛和她所热爱的学校,它会不可避免令人产生愤怒、自相矛盾的不同情感,而凯茜却令人咋舌地保持无动于衷,那么作为叙述者,她是否还那么可靠?如果不是接受了体制对他们的根本控制,她会如此自我谦避地镇定吗?”^{[12]300-301}

蒙田说:“我告白时,我深信我的内里存在着一个他者在质问我”^{[12]8},露丝和汤米就是凯茜叙述过程中内心不断质问她的他者。小说开篇,凯茜不无自满地强调作为人类的“他们”对她的工作一直颇为满意,可是这种追求“他们”的满意却令她不能从捐献者的角度与她的看护对象之间完全认同,甚至汤米都无法理解她对看护员工作的执着。汤米曾质疑,做一个好的看护员“真的那么重要吗?有个好看护员真的很不错。可是归根到底,这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捐献者要捐献,完全一样,然后他们的生命就终结了”^{[6]316}。凯茜对此的态度也有矛盾:“看护员不是机器。你试着为每个捐献者尽最大的努力,但到了最后,自己却被耗得精疲力竭。你不会有无穷无尽的耐心和精力。”^{[6]4}

黑尔舍姆赋予克隆人人性的计划,给了他们理性思维的能力,却也设置了一张他们无法逾越的网。凯茜虽然一直试图了解真相,但也常常逃避真相。她的叙述是在向读者讲述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其实也是在重温记忆。她在叙述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懦弱,在极力掩饰的过程中却摆脱不了被体制抛下、失去最好朋友的失落感。讲述之末的泪水是她对汤米的思念,也显然是对她的懦弱的哀悼。

3 读者移情:见证黑尔舍姆与他者身上的自我

凯茜在叙述自己的故事,实际也在充当自身经历的阐释者。叙述因为涉及到故事层面叙述内容面向的对象和文本层面的真实读者,他们也会主动参与对凯茜故事的阐释。纽顿对阐释过程中涉及的伦理做出解释:“阅读行为令读者产生伦理批评的责任”^{[5]18},此处的责任包含两方面,首先要理解悖论的存在,即得悉某人的故事,同时也是失去这个“真实的”人(“他是谁”)的一种方式,会使亲密感和伦理责任成为问题;此外,读者还需对此悖论做出反应^{[5]19}。简言之,读者需接受:我们离故事所蕴含的意义越近,我们其实离它越远。我们对故事承担的责任是一个“无限的运动过程”^{[15]20}。无论从故事层面还是文本层面看,凯茜故事的读者都会从自身的本体认知经验出发,对其做出不断阐释和伦理回应,在将自己的故事与她的叙事融合的过程中,消除它们之间的疆界,建构起克隆人之间、克隆人与人类之间的主体间关系。

就小说的故事层面而言,承担叙述听众角色的“你”在凯茜讲述的前三分之一部分始终作为与她互动的对象存在,他们不具有黑尔舍姆背景,但同样承担看护员工作。他们在凯茜的叙述过程中始终处于沉默状态,实则成了凯茜反观自己和黑尔舍姆体制的镜子。与他们相比,凯茜的“幸运”建立在人类为克隆人制定的人化培训机制上,其基础是严格的身体检查和对艺术创造力的规范化裁决。然而其结果,

“黑尔舍姆造就他们‘驯服的身体’，权力以知识的名义锻造他们‘臣服的主体’”^{[9]114}，他们最终不会逃跑，只能接受人类强加在克隆人身上的生存使命。克隆人的存在本身是人类“有意图地决定遗传本质”的结果，它意味着“一个克隆人一生都要受制于别人在他出生之前就强加给他的决断”^{[10]223}。尽管埃米莉小姐反复强调，黑尔舍姆给了克隆人最好的一切，但这是人类对他们的强力控制。无论是否接受过黑尔舍姆的人性教育，克隆人在黑尔舍姆内外的唯一存在目的并没有差异。凯西故事的“读者”很容易因他们共有的命运实现主体间的相互认同，聆听凯茜的故事也是在阅读他们自己的人生。

故事层面上的“你”是由“文本强制读者承担的‘叙述听众’的角色”^{[16]95}，它在叙事进程中很快延伸至文本层面的真实读者身上，因为读者始终能在文本阅读的参与过程中发现其与自己生存世界之间的互文性。布思(Wayne C. Booth)研究称，“无论我们是否具有批判性，我们阅读故事时总会隐含作者对这一简单问题——这是‘从前的事’还是现时代的事——的回答做出或误解或合理的决定。”^{[17]16}不管我们做出怎样的决定，它都会影响我们对文本的阐释。这有如“夫人”对凯茜抱着枕头和着音乐《千万别丢下我》跳舞的解读。凯茜想象那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终于生下自己的孩子，生怕孩子离她而去时的悲伤吟唱。但“夫人”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的迅速来临。更科学，更有效……对于以往的疾病有了更多的治疗方式”，“一个小女孩，她紧闭双眼，胸前怀抱着那个仁慈的旧世界，一个她的内心知道无法挽留的世界，而她正抱着这个世界恳求着：千万别丢下她”^{[6]304-305}。这催生“夫人”同情与不安的泪水，却也反映了读者在阅读凯茜的故事时所处的不安状态，陷于听完凯茜的讲述还是弃之不顾、始终挂念着她的故事还是丢开它的境地，被迫面对既产生强烈影响又无法令人下定决心的烦恼与移情的两难困境。

凯茜的告白将读者置于共同受害者的位置被动见证她所遭遇的不公，要求他们“不仅对他者产生同情，而且要认识到自己同样陷于造成他者必须面对的各种障碍的社会作用力中”^[18]。它迫使读者认识到自己的生存中相似的社会境况：我们不正与她一样生活在各种权利关系中，经受着由于我们自己的行为 and 选择产生的政治影响。黑尔舍姆试图通过克隆人的绘画能力向人类展示他们具有灵魂，如果具有灵魂就可确定他们与人类一样，那么人类就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谋杀的责任，因为人类培养了另一群人类，将之用作器官移植的来源，这是有组织的和共同认可的谋杀体制，与希特勒执行的对犹太人的体制性大屠杀如出一辙。像凯茜一样的克隆人，无论他们是否受到人性化教育，都改变不了他们捐献器官的命运。而我们同样面临并承受着如此体制性的强制力。

《千万别丢下我》令读者产生的通感体验并非源于抚慰人心的自由意识，即认识到克隆人与我们一样具有灵魂和人性，而应产生于一种更忧郁的认识，即“艺术与它所产生的移情作用应规避传统的人类的概念”^[19]。与其所描绘的克隆人一样，他们是克隆人又具有人性，小说结尾同样呈现出双重性：既具有诱惑力又消解一切。它需要两类读者，一类读者能无视其所描绘的关于克隆人问题的丑陋表象，另一类读者则能看透它所触碰的脆弱又复杂的灵魂。对于第二类读者而言，这部作品所蕴含的阴郁感会久久萦绕他们心间，而这正是《千万别丢下我》的审美魅力所在。

4 结语

如同大屠杀幸存者通过讲述向世人昭示他们所经历的创伤、见证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千万别丢下我》中的凯茜也以个体叙述的方式揭示了人类避而不谈的克隆人真相，要求人类见证对另一段真实的记忆。她幽怨却不失理性地呈现了人类培养克隆人女性和灵魂的黑尔舍姆体制和她对这一体制的依赖，渴望人类千万别丢下他们创造出来的克隆人。这部小说表面写克隆人，但它更是一个关于人类的故事。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探究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其内容之间的关系时强调，“人类的某些真相只能由善于讲述故事的高手用典型的语言与形式適切并准确地说出来”^[20]。凯茜的讲述以模像的形态复写了我们真实存在的世界，他们面对生存境遇的无从选择、受各种强制力左右的人生都是人类

自身在现时与未来可能遭遇的真实。读者在阅读中体验到凯茜所经受的种种情感,实现了对她的叙述应有的伦理回应。

参考文献:

- [1] 谷伟. 沅浮泡影——略论《千万别弃我而去》中“黑尔舍姆”的体制悖论[J]. 外国文学, 2010(5): 14-20.
- [2] Bates, Karen.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C]// Shaffer, Brian W, Cynthia F. Wong.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 Jackson: U. P. of Mississippi, 2008.
- [3] Ishiguro. Kazuo: Never Let Me Go[J]. Book Review. Kirkus Reviews, 2005(73): 67-70.
- [4] 刘小枫. 沉重的肉身[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5] Newton, Adam. Narrative Ethics[M].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6] 石黑一雄. 千万别丢下我[M]. 朱去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 [7] McDonald, Keith. Days of Past Futures: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as 'Speculative Memoir'[J]. Biography, 2007, 30(1): 74-83.
- [8] Cavarero, Adriana. Relating Narratives: Storytelling and Selfhood[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9] 蒲立昕. 驯服的身体, 臣服的主体: 评《千万别丢下我》[J]. 当代外国文学, 2011(1): 108-115.
- [10] 哈贝马斯. 后民族结构[M].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1] 杨正润. 现代传记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12] Robbins, Bruce. "Cruelty Is Bad: Banality and Proximity in Never Let Me Go" [J].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2007, 40(3): 289-302.
- [13] Cavell, Stanley. Disowning Knowledge: In Six Plays of Shakespea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4] 申丹. 对叙事视角分类的再认识[J]. 国外文学, 1994(2): 65-74.
- [15] Bok, Sissela. Secrecy: On the Ethics of Concealment and Revelation[M]. New York: Pantheon, 1982.
- [16] Rabinowitz, Peter J. Before Reading: 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7] Booth, Wayne. 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18] Whitehead, Anne. Writing with Care: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11, 52(1): 54-83.
- [19] Black, Shameem. Ishiguro's Inhuman Aesthetics[J].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009, 55(4): 785-807.
- [20] Toker, Leona and Daniel. Reader Response and the Recycling of Topoi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J]. 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2008, 6(1): 163-180.

(责任校对 晏小敏)